

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下）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235

导读：今天的内容是上一篇推送的延续，承接上次的对话，杜先生与王杰教授谈到悲剧问题，讲到相较于希腊悲剧以及西方从叔本华开始的悲剧研究，儒家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的悲剧意识能够生发出力量，而读书人作为这种力量的担纲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杜先生阐述了先知先觉的士的四个特征，指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探讨“何为人”、关切人本身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缺陷。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在美学领域所涉及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 20 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勒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王杰：其实儒家也有很深刻的悲剧意识。

杜维明：从最深刻的这样一种悲患意识来看，古典的希腊悲剧，就是说越有智慧、越了解现实、越能够有勇气面对现实，你就越悲惨。比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这些都是他的智慧、他的修身、他的磨炼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命定就是这样，这不是儒家的悲剧。儒家的悲剧更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和我们日常生活相联系。在儒家中，人的理想是要做圣人，而圣人就是最能够体现“仁”，也就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这种人通过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精神从和谐的家庭、正义的社会、安康的国家一直到天下大同。这个圣人的理想在现实的摸索过程中，一直在指导我们，要我们向前面超升，但是在每一步都受到限制的。可以这样说，像基督教，道成肉身，当肉身出现，它是

具体的，道就受到限制、受到扭曲，甚至受到异化。所以当理想落实为具体行为必然会有张力、异化乃至冲突，孔子的存在选择是“鸟兽不可与同群”，他要进入世间来，他没有一个未来的天国，他也没有上帝、乌托邦的理念，他所选择和面对的就是在现实，他每天碰到的都是人的生活世界，其中当然有悲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想要做、我知道自己能够做的和我实际做的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大。当你有能量要发挥的时候，你却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因为色、或者是因为斗、或者是因为得，使你无法随心所欲。而当你有了智慧，你理解到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不够了。我们把这叫做一个人的知性的缺失和感性的充沛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生的悲剧。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轮回。严格说来，不管你的人生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你只有一生。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背负的就是“仁”，每一个人的“仁”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人体现的“仁”就是整个人类整体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够做到那么一点，人类的仁就会上升，而消除了就会下降，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感，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都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层层限定、层层破除限定的奋斗之中，这里边都是悲剧。比方说两个人，如果说是男女之情，完全能相悦、完全能融合无间其实很难。对于两个知己来说也很难，这是两个人之间。那么家庭中有三五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就是说，真正到一种磨合得最好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古典儒家的悲剧就是孟子讲的舜的故事，舜的父亲是一个残忍的人，舜的后母也对他极不友善，他的继弟还要抢他的财产，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最坏的家庭里，他居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和谐。这个人了不起，所以他的孝能感动天地，这个就是例外的例外。也许中华民族就出现这样一个人，所以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应敬佩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这种悲剧的意识不是希腊的悲剧意识，是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 杰：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悲剧意识。

士的自觉

杜维明：读书人，就是在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一批人，先不说精英不精英，事实上就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恒产也无恒心的，既没有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不会有更高的道德。但是有一批人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他有自觉、有先知先觉。这一批人数量很少，但文明的进步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他们有主体性，他们的主体性就是立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在奋斗，这个就是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仁人志士太多了，你看共产革命里面那些了不起的、重要的人物，悲剧下场的太多了，他们都有强烈的主体性。

第二，这个人的目的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社群或阶级而是为了人类全体——不仅是中国人的全体，而且是人类全体，所以才有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情况下面，就算是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

再次，他有非常深刻和浓厚的历史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了，到了孟子更是，他的历史意识很强，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历史意识。

同时，他还有非常强的天道观念。先不说是替天行道，孔子主要认同的一个是文王，一个是周公。如果“文”是被坠于地的，那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做，这是我的责任。孟子说“舍我其谁”。至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力量。我们在不同环境、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

最后，他面向的是未来。他绝不会为了目前，而是为了千秋万世，所以才有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

这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马有两大缺乏。首先，他没有注意到世界的问题，也没什么生态概念。其次，没有注意到精神世界也就是宗教的问题，或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够。他认为物质世界改变以后，精神世界的基础结构就改变了，这在现在基本上是站不住了。先不说韦伯的批评，用以前毛泽东所讲的话，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意识就是价值优先的问题，我们人可以自足，价值优先是塑造一个个人和民族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性我们现在没有，可是这个方向性非定不可。这关系到未来和怎样的未来。我有这样一个比喻：拿火车轨道和火车头的关系来说，经济是火车头，火车头的动力极大。在“文革”的时候，全部力量摆在政治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那么现在改革开放拼命在搞经济，结果现在我们变成市场社会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面向了公共空间的理念，为公民社会及民主建构等大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回归身心性命之学

王杰：其实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经历中也涉及到悲剧，但是就如您刚刚所讲，他还是比较关注革命意义上的悲剧。所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里用的是“革命悲剧”这个概念。他把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种模式，然后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另一种模式，并没有从人生的价值意义这个层面来讲，也许这是不够的。

杜维明：这是不够的。如果从孟学讲起，第一，你要有身心性命之学。这个不仅马克思没有，康德也没有。当然牟宗三后来用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康德没有对“智的直觉”，这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在康德的整个思想里面，他都没有办法为人性建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海德格尔对他的批评是对的。我们怎么知——认识论，怎么行——伦理学，怎么希望——神学，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何为人”的问题。对于“何为人”的问题，康德照顾得太不够了。他没有深度心理学，因此神学上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认为神学不可能在上帝存在或者灵魂永灭的方面来建立它的独立性，只能说是道德律令的独立性，这是他的了不起的大贡献。对于“何为人”的问题也许是西方的艺术作了讨论，但是这一方面他并没有讨论。当然，海德格尔是有的，然后是存在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

就像我们这次会议上特别讨论到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但在今天看起来，这些人都是比较软性的，首先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够深刻、不够彻底、不能转化现在这种大的问题，这是绝对不够的。其实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都是我很欣赏的人物。

首先你要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记忆和一个轴心文明经过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资源，印度有，犹太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有，中国也有，这就要求我们要回到轴心文明。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来看，雅斯贝尔斯在很多地方可能比韦伯更重要。当然，这个工作很艰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遇见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看过《四书》，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样，一个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却不知道《共产党宣言》，对《资本论》一窍不通，这也是不行的，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所以这是一个大考验。

就我们这个合作而言，大家都需要了解的是，人文学，特别是整个哲学在中国彻底边缘化了。当你走进一所大学，你不晓得要走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人文学院；在人文学院中，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哲学系。我举个例子，北大一个很有名气的哲学教授，非常欣赏人大附中的一个女学生，就建议她学哲学。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女孩子哭哭啼啼跑到他家里面，她说你怎么这么看不起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考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你以为我只可以念哲学吗？这样的事情太糟糕了，说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完全扭曲了。

王杰：哲学的衰落其实就是文化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衰落。我来交大后，重建了哲学系，但一直生源不好。我们现在想在本科教学层面作些改革，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话，我想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问题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希望在杜先生的支持下，把这件工作做起来，认真做好。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sOUwWmGF_u4MiPp2bQUSQ